

2206
wzj

主编 饶芃子



比较文艺学丛书

Bijiao Wenyixue Congshu

王 琢 编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责任编辑 周书田

封面设计 王 霖

责任监制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王琢编.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3

(比较文艺学丛书/饶芃子主编)

ISBN 7-81083-066-X

I. 中… II. 王… III. 比较文学—中国、日本—参考资料—汇编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194 号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王 琢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杭州南山路 218 号 邮政编码:310002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80 千		印数:0001—2000
ISBN 7-81083-066-X/I·1		定价:40.00 元

《比较文艺学丛书》总序

饶芃子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多年来，这个领域已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有了许许多多的成果，还有了自己的刊物、队伍、组织，并且进入了高等学府，形成独立的学科，有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等高学位点，高层的学术活动也已同国际比较文学界接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日益成为了一门显学。”（见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回顾这个过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其发展，是与学界人们世界性视野和开放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就是要突破文学研究的国家、民族、地域、文化和学科的界线，以新观念、新眼光开展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比较文学的开放交流精神是它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的，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早在19世纪末，比较文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认为世界各国、民族、地区的文学，都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现在，历史发展到21世纪，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资信发达的时代，文化、文学交流频繁，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异国、异族的影响，还有不同学科的交叉介入，因而研究者在面对本国或外国的文学问题时，都必须有世界性的广阔视野与眼光，将其放在世界文学格局和国与国文化、文学关系中进行考察，才能探得其究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在学坛的勃兴，正是与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发展潮流相适应。

近 20 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诗学兴起,中国诗学的价值日益为人所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成为比较诗学的一个新的拓展方向。美籍华人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倡导、研究上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不仅把自己的倡导变成实践,还从理论上阐明中西比较诗学的目的和价值,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 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在他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中,也特别说明中西比较文学必须导向中西比较诗学的道理,他认为,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表层的比较,而应深入到“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叶维廉:《比较诗学》第 16 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年)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建构批评理论。在我国,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都是新时期中西比较诗学路碑式的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与一般的中国或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国际的眼光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超越本民族文化体系的美学模式,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或者说,去促进“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以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对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一领域的成果同文艺学学科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在这两者的交叉领域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用以推动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发展,就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而这,正

是 90 年代我们在建设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时,把比较文艺学作为一个新方向建立的学理基点。

全球化的 21 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文艺学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有许多世界性的因素,无论是从总结以往学科史的经验,还是对学科前景的思考探索,都必须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当今,人类共享的知识基础的范围日趋扩大,随之而来产生了文化的日趋融合,世界各国的理论家均具有多国学术的亲缘关系,经常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互识、互补,通过不同文化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研究,创造更加宏阔的学术空间,有助于突现自己的学科个性、学科的前卫精神。学科建设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学科的内部而言,要有本学科新的理论建树;从学科的外部而言,要能对整个学术界和时代前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现状看,成果很多,其中有许多是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如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有从其中的某些理论出发来阐明我国文学问题的;还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演讲过程作综合研究的;对中西文论总体特色和范畴比较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相对而言,对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太少,结合历史和现状,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论发展中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研究亟待展开,而这两方面又与资料建设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专题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所谓资料建设,应包括目录、索引、资料汇编、选编等,以前这方面成果很少。这与过去学术界对资料工作的轻视有关,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资料收集、整理、编选,不是科研成果。近几年,学界对人文学科中资料建设工作落后现象,已给予关注,其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出。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的学

科发展，同样不能忽略这方面的工作。

正是出于上述的思考，我主编了这套《比较文艺学丛书》。

本丛书共六册，三册是研究资料汇编，三册是专题研究论著。研究资料汇编分别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饶芃子、王琢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郁龙余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钱超英编）。所辑录的文章和有关研究资料，都是从大量原始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其中不少是中外知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我们的编选原则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旨在向学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较少人注意的几个学术领域。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到中日、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沿革，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概况。《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把80年代以来的研究论文按编年史编出，并附有文献目录要览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资料，还附录选编者撰写的两篇介绍中日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概况的文章。《中国、印度比较论文选》（1987—2001），是国内首本这一时期的中印文学比较论文选。由于8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诗学等，均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编者没有按编年史编排，而是以内容类别分成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两大部分，还附录了编者在这之前编选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一书目录，该书于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联合出版，搜集的资料是从近代至1982年，同现在这本“论文选”有上下衔接的关系。《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是我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文化问题的批评、研究资料集。该书多数文章直接得自海外，而在此前未为国内读者所见，在编排体例上，是以文章内容分类编辑，全书分综观篇、专题编、交流编三大部分，从不同方面展示澳华新移民复杂的文化生态和景观。

三本专题研究论著，分别是《赋、比、兴的现代阐释》（陈丽虹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著）、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卫景宜著)。《赋、比、兴的现代阐释》着重追问、探索传统的赋、比、兴诗学范畴在现代是如何被阐释的。关于赋、比、兴,汉代经师及其后的历代论者,作出过极为纷繁的解说;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大陆和海外学者也提出过诸多新说。本书作者则着重追溯从“五四”至1949年的30年中,学界对赋、比、兴的新解,这一阶段,正是传统模式向现代新模式转型的时期,从黄宗羲、梁启超到胡适、郭沫若,倡导和实行诗界革命,诗学思想相应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考察这一背景下赋、比、兴的动态涵义,既注意传统的延伸,又把重点放在论述其“现代”的变异,以个案的形式参与当前“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讨论。特别有创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不仅注意学者对赋、比、兴涵义的理论探索,还注意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体现、流露的诗学观念,因而在立论上显得通达而带有生气。《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的是近20年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其进入中国大陆之后的理论形态,如何获得有效生存等问题。作者深入到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內部,对有关资料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概括出“建构式”、“兼容式”、“颠覆式”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类型。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批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整体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真正重视,因而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开拓性。对于比较文艺学而言,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为个案,来探讨“传播与影响”的理论问题,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分熟悉,占有详尽的材料,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整体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因而能从一个理论较高点上描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这一授一受过程,及其被中国化的命运。在书中,作者不但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生长”,也探讨了它存在的困境和可

能的发展空间,颇有史论意味。《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以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系列小说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中国书写,放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史、美国华人史以及美国文化三重背景下,进行互动性研究和跨文化审视,指出此类作品与西方主流霸权话语的内在对抗;这种文学写作的边缘文化属性。分析这些作品中挪用、改写中国文学经典故事、建构新的华裔文化形象的独特价值,阐明这些生活在西方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华裔族性和情感,提出民族文化持存是一个不断改变、建构的开放过程。作者在论述中,借鉴了西方的文化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写作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一手资料的占有和对资料的理论提升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目前国内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较为可靠和整体性成果。近20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大陆学界兴起,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研究海外华裔英语文学则甚的罕见,前不久出版的钱超英博士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本人主编的万叶文丛·学术书系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是第一本研究1988至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将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和华裔英语文学整合研究的著作,该著作的关注点是海外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本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关注点是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书写,这就从一个方面拓展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本丛书所以命名为《比较文艺学丛书》,是因为这六本书作者所做的,都属于比较文艺学的基础性工作,虽然比之应该去做的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它们只是一些小小的“点”,但“面”的工作总是从“点”开始的,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就具有某种意义上开拓性。

2001年6月16日于暨南园

目 录

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	肖瑞峰 (1)
日本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	严绍璁 (19)
和歌理论的形成与我国诗学	赵乐甡 (40)
《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	曹 旭 (57)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严绍璁 (78)
《源氏物语》里的孝与不孝——从与《史记》的关系说起	
..... [日] 田中隆昭 (92)	
《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	王 琢 (109)
中国的志怪小说和日本怪奇文学渊源	王晓平 (127)
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	赵乐甡 (139)
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的影响	何德功 (152)
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贾植芳 (166)
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	
..... [新加坡] 王润华 (184)	
鲁迅的早期尼采观与明治文学	[日] 伊藤虎丸 (201)
日本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孟庆枢 (226)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节——中日近现代文学主潮比较	
..... 陈 泓 (244)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转变的“中介”——河上肇学说	
..... 靳明全 (257)	
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	
..... 张福贵 (269)	

佐藤春夫和郁达夫——以《田园的忧郁》和《沉沦》为中心 …	
.....	刘立善 (282)
胡风 and 厨川白村	王向远 (289)
太宰治与中国文学——关于《清贫谭》和《竹青》	
.....	[日] 村松定孝 (300)
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	王向远 (313)
现代日本文坛与鲁迅	靳丛林 (331)
“人民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评论	王晓平 (343)
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	[日] 藤井省三 (362)
20 世纪中日比较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王 琢 (370)
20 世纪日中比较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王 琢 (386)
20 世纪中日/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文献目录要览 …	王 琢 (405)
注释	(568)
所收论文出处	(593)
后记	(596)

中国文化的东渐 与日本汉诗的发轫

毋庸置疑，日本文化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处在中国文化的笼盖下。在公元前 6 至 5 世纪的“绳文文化”和公元前 2 至 1 世纪的“弥生文化”时代，日本尚没有自己的文字。日本文字的产生，有赖于汉字的传入。一般认为，汉字是伴随着中国典籍一并传入日本的。根据国史中的明确记载，中国典籍的传入始于日本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御宇时，约公元 300 年前后。但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典籍舶来的时间应当比这更早。于是便产生了“徐福赉书来日”说及“神后征韩收书”说。

徐福乃秦代方士，曾奉始皇之命，入海求“不死之药”。其事见于《史记·始皇本纪》。而日本是所谓“东瀛之国”，恰当其途。后人便据此生发：在后周义楚的《释氏六帖》中已出现“徐福来日”说；在这基础上再加演变，“徐福赉书来日”说便蜕化而出了。宋人欧阳修《日本刀歌》有云：

前朝贡献屡往来，
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生行时书未焚，
逸书百篇今尚存。

日人北皇神房的《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条亦有类似记载，且云：“此事载于异朝之书。”比观这两条材料，可知“徐福赉书来日”说流布于世的时间不会晚于五代末或北宋初。但仅以时代远后于徐福的欧阳修的诗歌及《神皇正统记》的记载作为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因而，援为谈资固无不可，视为定论则有欠审慎了。

“神后征韩收书”说本于《日本书纪》。《日本书纪》记神功皇后征韩事曰：

遂入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典籍舶来之始。但其间亦有疑问：《汉书·高帝纪》记高祖入咸阳市曰：“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用纯汉文写成的《日本书纪》很可能是援其绪而仿其辞，未必真有“收图籍文书”之事；退一步说，即便真有其事，所收之“图籍文书”，也可能属于地图户籍及官府公文之类。通读《史记·萧相国世家》及《汉书·萧何传》等即可了然。所以，“神后征韩收书”说似也不足征信。

既然如此，在找到更为确凿的证据以证成上述二说前，似乎还是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把中国典籍舶来的时间暂时定点在正史所记载的应神天皇御宇时：应神天皇承“神后征韩”之后，绥内靖外，国运渐昌。于是，百济国阿直岐、王仁等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中国典籍入朝归化。《古事记》记其事云：

百济国照古王，以牡马壹疋、牝马壹疋，付阿知吉师以贡上。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称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

这是国史中有关中国典籍传入的最早的记载。《日本书纪》所记略同：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是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另，《古语拾遗》一书也记载了应神天皇御宇时百济国贡王仁事。因而，王仁的来朝与汉籍的传入皆在此时，是确凿无疑的事情。由于人们一般都认为，汉字是伴随汉籍而传入的，所以许多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便将汉字的传入也定点在应神天皇十六年。

但窃以为这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汉字实在并不一定非随汉籍传入不可。尽管汉籍舶来后，日本国的先民才有可能系统地接触汉字；但这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汉籍舶来前，已有一些汉字零零星星地传入。据《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帝中元二年（57）曾赐日本九州筑前怡土郡一豪族以封爵金印。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1784），这颗金印在志贺岛叶崎的石窟中被发掘而得。既为金印，上面镌有汉字自不待言。又据《魏志·倭人传》载，魏明帝正始元年（240）曾遣使者赍诏书、印绶赴日，而日方亦曾托该使者答谢恩诏。因此，汉字的传入要早于汉籍的舶来，应当也是确凿无疑的事情，虽然究竟要早多少，现在已无从考稽。

不过，零星传入的汉字，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远远不及既汇入汉字、又融入汉学的汉籍。从应神朝汉籍传入，

到继体、钦明朝五经博士相继东渡，凡 270 余年间，研习汉字、汉文、汉学、蔚为风尚。至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时，能用汉文写作的，已不只是那些执教席、掌书记、充史官、任翻译的“外朝归化”者；许多一直生活在日本本土的人，也已初步掌握了写作汉文的技能。在日本历史上，推古朝是开辟新纪元的时代，氤氲着活泼、兴旺的气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亦复如此。在这革故鼎新的过程中，圣德太子起了关键作用。《日本书纪·推古纪》叙太子事曰：

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之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举外典于博士觉智，悉兼达矣。

《法王帝说》中也有关于其学德之宏大深远的记载。既具有卓异的秉赋，又具有深厚的学殖，加以其摄政时血气方刚、敢作敢为，很快便刷新了政治局面，而日本汉文学亦随之诞生：宪法十七条、外交文书、金石遗书等都于此时问世。

先看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有云：“十二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虽然太子有可能征求过簇拥在他周围的“智囊团”的意见，但十七条主要体现的应当是他自己的旨意。今日研读十七条，可以看出，它完全本乎国民性情，取乎儒家思想，而又益以佛教教义、参以刑名法家学说，其名固与今日之宪法相同，其实亦足垂范后世。没有谁能否认：日本之法制，盖自十七条始。从文学的角度看，十七条文字精炼，造语简古，略无骈俪浮华之态。作者广泛取资于《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孝经》、《左传》、《礼记》、《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史记》、《文选》及佛教经典，却又力避蹈袭，变化用之。每条长则 75 字，短则 24 字，言简意明，不务繁冗。其句式以四字句为主：全篇凡 180 句，其中四字句达 144 句，宛然

有律语之趣。其风格则简奥奇峭，与法家文风较为接近。

再看外交文书。日本皇室向中国遣送正式的国书，始于推古朝。推古天皇十五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605），大礼小野妹子奉命遣隋。回国时，隋炀帝派大臣裴世清偕其同归，以行聘礼。裴氏所携除信物外，尚有炀帝手书。裴世清回国后，日方复命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副使，再度遣隋。中日交换国书，实在此时。日方所奉之二封国书，一见于《北史》、《隋书》，而未为《日本书纪》所收；一见于《日本书纪》，而未为《北史》、《隋书》所载。前书起笔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雄大之气自句中溢出。可惜下文今日已不可得见，唯存此吉光片羽。后书据《经籍传后记》及《太子传略》所记，乃至德太子之御笔：

东天皇敬曰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清想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大礼乎那利（吉士雄成）等往。谨白不具。

起句沉稳、庄重，中间的文字则真挚简率、有六朝尺牍之风范。

至于金石遗文，亦可溯源至推古朝。推古天皇四年（594），圣德太子率惠聪、葛城臣等行幸伊豫的温汤宫，并于汤冈之侧立碑铭文记其事。这便是今存最古老的石文《伊豫道后温汤碑文》。其文为《伊豫风土记》所收录，属四六体；多用汉魏典故，颇见苦心经营之痕迹。但其风貌虽与齐梁文学相近，却未失尚古倾向。推古朝的金文保存至今的有《元兴寺露盘铭》等六种。其长短各异，雅俗有别。就中，《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作为准汉文体，最为古奥：

池边大官治天下天皇（用明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推古天皇）与太子（崇峻天皇）而哲愿赐。我

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官治天下大王天皇（推古天皇）及东宫圣王（圣德太子）。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仕奉。

此铭乃推古天皇十五年，天皇及太子为用明帝造药师像时，刻于其光背之土。形式为汉文，但其中却又交织着日语的句法，因而一般视之为准汉文的滥觞。此外，国史的编辑、佛经的注疏等文化事业也始于推古朝。要言之，推古朝时既有纯汉文，也有准汉文；而纯汉文中又包括散文、骈文等。因此，有理由认为，汉文的诸体早在推古朝即已具备。而汉文的全面发轫，不用说，有助于汉诗的萌生。

推古朝以后，汉文学以一泻千里之势迅猛发展。至近江、奈良朝，已渐趋兴隆。其标志是两部经典式的史书的产生：准汉文国史的嚆矢《古事记》与纯汉文国史的权舆《日本书纪》。斋藤谦在《拙堂文话》中评《古事记》曰：“微古典雅，文辞烂燃。”又评《日本书纪》曰：“虽有模仿史、汉、鸿烈等书处，然叙事有法，用字亦皆合格，与近古老生之文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还产生了日本最古老的地方志《风土记》，其体由纯汉文与准汉文错杂而成。如果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中央文学的代表的话，那么，《风土记》则是地方文学的典范。而随着汉文学的日渐兴隆，提高了审美情趣的贵族阶层已不满足于吟讴本土的俚俗歌谣，更欲借助汉诗这一舶来的文学样式，作为新的言志抒情的工具。这样，日本汉诗便应运而生。

稽之史料，这大概是近江朝的事情。天智天皇御宇时，躬亲朝政之暇，常招学士大夫宴饮赋诗，歌咏升平。对此，《怀风藻·序》略有所记：

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

献颂。雕章丽笔，非唯而篇。

可惜天智天皇的御制及其词臣的诗作早已亡佚。因此，连《怀风藻》的编撰者在当时也只能以“非唯百篇”的悬想之词来形容其篇章之盛。所幸弘文天皇的御制《侍宴》尚存，可藉以稍窥当时的文采风流：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

此诗为《怀风藻》所收录。当时的弘文天皇尚为东宫太子，侍宴在侧，故其所作由歌功颂德的文字堆砌而成，并未能跳脱庸常的侍宴之作的窠臼。但其气象之阔大、文笔之典丽，实为庸常之辈所不及。作为日本汉诗萌生之初的作品，尤属难得。因此，后世的诗人每当追溯本国汉诗的起源时，总是对弘文天皇不胜景仰。维新时期诗人国分青崖的《咏诗》有云：

弘文聪睿焕奎章，
东海诗流此滥觞。
仰诵皇明光日月，
于今艺苑祖君王。

既把弘文天皇的这首诗视为日本汉诗的滥觞，更把弘文天皇本人奉为日本汉诗坛的始祖。

二

事实上，不仅日本汉诗的形成有赖于中国文化的沾溉，而且